

中国共产党与 国家建设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Building in China*

林尚立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与 国家建设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Building in China*



林尚立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 / 林尚立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1

ISBN 978 - 7 - 201 - 05800 - 9

I. 中… II. 林… III. 中国共产党 - 关系 - 国家 - 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D25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2306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9.5 印张 2 插页

字数:350 千字 印数:1 - 5,000

定 价:45.00 元

目 录

导论	1
----------	---

第一篇 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国家建设

第一章 政党与现代国家:中国的逻辑	15
第一节 帝国体系:一种高度秩序化的政治	16
第二节 国家转型: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逻辑	20
第三节 政党国家:政党在中国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24
第四节 现代国家:中国崛起的国家形态	27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化	31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历史贡献	31
第二节 中国现代化的内在机理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3
第三节 现代化发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时代性挑战	36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9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反思与探索	39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战略性问题	46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54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与政治文明	60
第一节 政治文明的选择	61
第二节 政党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使命与责任	63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探索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践	64
第四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与战略选择	67
第五章 迈向现代国家的政治发展	73
第一节 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马克思的理论	73
第二节 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现代社会发育	76
第三节 市场经济与中国政治形态转型	79

第四节 走向现代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趋向	81
第六章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	86
第一节 制度与科技:中国在学习中成长	86
第二节 创新型国家:制度使创新成为发展的灵魂	89
第三节 政府改革:为创新体系而创新制度	91

第二篇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民主建设

第七章 人民民主的意义	97
第一节 人民民主的本质	97
第二节 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民主	100
第三节 人民民主与执政为民	105
第八章 创造有序民主化	110
第一节 有序民主化与中国政治发展	110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的有序发展	114
第三节 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有机互动创造有序民主化	117
第九章 共和与协商政治	120
第一节 协商:共和政治在中国的基础	120
第二节 协商:民主集中制有效运行的机制	124
第三节 协商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129
第十章 党内民主的价值	135
第一节 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	135
第二节 党内民主的探索与实践	140
第三节 党内民主的边界	146
第四节 制度在党内民主中的作用	150

第三篇 中国共产党与和谐社会建设

第十一章 党、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系	157
第一节 权力组织网络	158
第二节 权力组织网络与党的领导	160
第三节 党的集权与以党代政	164
第四节 中央集权与党的中央集权	170
第五节 分权及其运动逻辑	176
第六节 权力组织网络与权力关系变迁	181

第十二章	中国社会建构:政党与非政府组织	185
第一节	政党与组织化社会	186
第二节	社会组织化与政党	188
第三节	政党与非政府组织	191
第十三章	整合社会的轴心与外围结构	196
第一节	中心支柱与轴心体系	197
第二节	向心性整合:从轴心到外围	199
第三节	同构性整合:外围组织的反向发展	203
第四节	认同性整合:轴心与外围的交互作用	206
第十四章	统战创造社会和谐的战略与策略	211
第一节	统一战线与国家建设	211
第二节	统一战线与社会和谐	215
第三节	统一战线与政党领导	220
第十五章	党、国家与社会的微观关系	224
第一节	社区形态转型与政党角色	225
第二节	国家与社会博弈中的政党	227
第三节	社区自治中的政党推动	230
第四节	自治与党建共生的制度安排	233

第四篇 中国共产党与执政体系建设

第十六章	政党执政的政治逻辑	239
第一节	阶级、社会与合法性	240
第二节	政权、国家与有效性	242
第三节	组织、制度与制度化	244
第四节	纲领、理论与创造力	246
第五节	功能、资源与整合力	249
第六节	变革、发展与全球化	251
第十七章	党领导核心作用的现实基础	255
第一节	社会主义:党领导核心作用的合法性基础	255
第二节	政党建设:党领导核心作用的政治基础	258
第三节	依法治国:党领导核心作用的制度基础	260
第四节	政治整合:党领导核心作用的社会基础	262
第十八章	全球化时代的执政方略	266
第一节	全球化的政治意义	266

第二节	全球化对执政提出的挑战	268
第三节	新时期执政的战略对策	269
第四节	新时期党政关系的制度安排	272
第五节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与程序	276
第十九章	制度整合与党的建设	279
第一节	用党的建设推动国家建设:中国的战略	280
第二节	用创造性党建统一先进性与执政能力建设:价值、组织与制度	281
第三节	创造性党建的战略基点:制度整合发展	284
第四节	制度整合发展的行动路径:党内民主	287
第二十章	基层组织与党的执政资源	291
第一节	基层组织是党执政的战略资源	291
第二节	组织创新提升党的先进性与执政能力	294
第三节	基层组织建设的两大行动空间	296
参考文献		301

导 论

历史是人创造的。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人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被历史所塑造,但从根本上讲,人的发展决定着历史的发展。现代文明的出现,正是人的发展的结果。人的自主和独立的实现,使人类历史从传统跃进到现代,并开启了现代化历程。自主与独立,在赋予人自由的同时,也赋予人无限的创造力,以至于使现代化的发展成为一种无限的可能。自主与独立,是人的发展的质的飞跃,所以现代化发展相对于以往的历史发展来说,也是质的飞跃。自主独立的个体创造了现代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形成了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并由此创立了与传统邦国或帝国完全不同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确立和成长与现代化发展紧密相关,两者是相互作用的,甚至是互为因果的。因而,任何试图迈向现代化的社会,都面临着建设和发展现代国家,使现代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得以有效成长的历史任务。国家建设既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这要求任何领导和推动现代化发展的社会和政治力量,都必须有能力推动现代国家的成长。

中国是在试图用现代国家要素改造传统帝国的努力中迈入近代的。虽然这个努力没有成功,但传统帝国的崩解还是为现代国家在中国的确立提供了充分的历史前提。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全面开始建设现代国家的努力,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也由此开启,至今已近一个世纪。在这个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扮演了核心角色,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建立了新中国,开辟了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现代国家建设和发展历程,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之间的深刻的内在联系,既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程,也决定了中国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所以要把握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就不能不把握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与互动。

一

中国现代政党萌芽于帝国体制危机之中,但其真正的确立和成长却是在帝国

体制崩解之后。^① 共和的出现为现代政党的全面确立和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然而中国的历史逻辑表明,在帝国体系走向崩解、现代国家体系得以诞生这样的历史交替过程中,相当稚嫩的现代政党虽然是其中的活跃角色,但不是决定力量。传统帝国体系是在内外交困之中走向崩解的,共和随之取而代之。换句话说,现代共和对传统专制的替代,是以传统帝国与帝制的崩解而实现的,不是现代共和卓有成效地发展的结果。于是在中国,以共和形式确立起来的现代国家,在其诞生之后,就面临着如何有效成长的问题。

对于中国这样在帝国体系解体之后依然在经济与社会形态上处于前现代的社会来说,其现代国家的成长须臾都离不开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而中国要进行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就必须首先争得主权,以摆脱帝国列强;统一政权,以消除军阀割据。主权的获得和政权的统一,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革命,就是武装斗争。辛亥革命的意义在于结束帝制、推倒帝国。虽然共和因帝制的终结而开启,但统一的现代国家并不因帝国被推翻而确立。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亲身政治实践中深刻领悟到,共和要在中国最终确立,需要解决民族、民权与民生问题;要解决这三个问题,非要进行革命不可;而这种革命要取得最终的成功,非要现代政党与军队不可。^② 为了扭转辛亥革命之后国家不但没有发展反而退步,并日益陷入亡国危境的局面,孙中山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下,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创设黄埔军校,实施北伐。

用政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来进行中国革命,并由此支撑和推动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实践的总结,是其在各种失败和教训中感悟出来的真理。这个中国革命先行者所昭示的真理,并没有被国民党所真正继承,相反却在力图挽救民族危亡的中国共产党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辛亥革命之后,与生俱来的使命就是挽救民族危亡,解放劳苦大众,建立民主共和,实现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复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为现代国家在中国的成长而诞生的;而诞生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就力图承载起推动国家建设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清楚地知道,要成为国家建设使命的承担者,就必须使自身成为中国国家建设的中心支柱。为此,必须进行三方面的努力:首先,必须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拥有绝对的领导权;其次,必须拥有革命的武装力量,并通过武装斗争去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最为关键的是党必须建立人民武装,并领导人民武装进行人民战争;最后,必须以党为核心

^① 参见杨幼炯:《中国政党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

^② 1924年,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前后的一系列论述都不断地在阐述这些基本问题。参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37~615页。

团结和凝聚全社会的积极力量,在塑造党的中心地位、提升党的中心支柱作用的同时,也使得整个社会围绕着这个中心而获得整合和统一。上述三方面的努力,被毛泽东概括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①中国共产党借助这三大法宝,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同时,也正是基于这三大法宝,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中心支柱。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建设的逻辑也就从革命的逻辑转向了建设和发展的逻辑。在革命的逻辑下,国家建设关注于主权的确立与政权的统一;在建设和发展的逻辑下,国家建设关注于现代化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育。正如在革命逻辑下的国家建设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样,在建设和发展逻辑下的国家建设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这种领导不仅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是在缺乏现代经济与社会基础的情况下开始现代化发展的,这种现代化必定要借助有效的核心力量,来支撑其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框架;必定要借助有效的领导力量,来整合资源、规划全局、把握机遇、创造合力,以实现跨越式快速发展。可见,当中国迈入现代化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基本国情和现代化的逻辑决定了中国国家建设对有效政党的需求是内在的。这种需求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应这种需求,成功地领导了中国革命,建立了主权独立国家,并由此开始在现代化发展基础上推动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

虽然并不完全是现代政党导致现代国家在中国的诞生,但是现代国家诞生之后所孕育出来的政党,却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决定力量。换句话说,中国迈入现代国家建设的时代不是政党直接推动的结果,但是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和成长却完全依赖于政党的领导与支撑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政党是现代国家的建设主体。就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确立来说,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者,而且也是缔造者。政党与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也充分决定了政党在国家建设中的中心地位和核心作用。所以考察中国的国家建设,是无论如何不能无视政党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相反,必须高度重视这种作用,并仔细把握其中的关系和逻辑。否则,我们对中国国家建设之道的把握永远触及不到根本。

二

虽然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对民族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是与生俱来的,但对其所要建立的国家的构想,则是在不断思考和探索的过程中明晰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其成立时所发布的第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新政权、新社会的主张,而对于建设“新国家”并没有清晰的概念。然而一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2~614页。

建设一个新国家开始进行比较系统的思考。蔡和森认为,到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党才开始分析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①。正是在这种分析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第一份建国构想,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表达的建国构想。具体内容是:①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②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③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④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⑤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⑥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⑦制定关于工人农民以及妇女的法律。^②显然,这个时候的国家建设构想与后来的国家建设实践有相当大的差别,其中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关于国家结构形式的构想。最初的建国构想是联邦制,而后来的建国实践是单一制。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最初构想国家建设的时候,虽然考虑到了中国的现实,但其理念更多地是从革命的理想追求和苏俄的经验出发的。在此后几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对未来国家建设构想提出新的主张,直到大革命失败。

大革命失败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建构未来国家的构想。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再把国家建设作为革命的预期目标和成果而将其独立于革命的进程,使其与革命进程相统一,强调革命的过程与国家政权的建设过程是有机统一在一起的。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的全部行程告诉我们,要把像俄国十月革命前那种‘二元政权’(一方面是苏维埃,另一方面是临时政府)的局面重现于中国,是少有可能的。十月革命前,将来的政权核心曾与旧政权对峙。但这在中国是难能的。而且我们预料经过工农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后,新政权必将即时实现,这就是说和俄国一九一七年苏维埃事前能够公开存在,不会一样。因此,中国共产党便须一方面采取必要办法,事先秘密建设政权的机关,另一方面采取必要办法,俾武装起义后可以坚决而敏捷地成立政权机关。”^③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中国共产党把建设革命政权看作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与革命的武装斗争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此前没有建立政权的直接经验,为了能够有效地推进革命政权的建设,党的六大决定全面推广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建设经验。《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要求:“中国党应利用苏联苏维埃建设的经验,普遍此经验于党员及广大群众中去,俾预先准备干部人才,以敏捷的建设政权机关。党应在预定的各武装起义区域中,预先普遍地明了地传播苏维埃的理论,宣

① 蔡和森:《吾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使命》,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2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15~116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90~391页。

传苏维埃政权之一切具体形式与具体工作,准备民众在该区域起来时,有迅速建设苏维埃的可能。”^① 将武装斗争与政权建设有机统一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农村开辟出一个又一个革命根据地。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包括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在内的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拥有一支兵力达十几万的红军队伍。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构想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根据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另外,大会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细则》、《地方苏维埃政府暂行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划分行政区域暂行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等条例法令。^② 由于中国共产党毕竟没有掌握全国政权,所以这些条例法令与其是建立国家的条例法令,不如说是建立革命政权体系和革命根据地的法律条例,它针对的不是未来国家建设,而是现实的政权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实际。但是对于后来的国家建设来说,由此开始的政权建设实践却是党领导国家建设行动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中国共产党也就自然放弃了党的二大提出的用联邦制建构未来中国的构想,但没有因此动摇对国家统一和民族自决的追求。

中华苏维埃政权是工农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名副其实的工农民主共和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临时中央政府力图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使命。在为这个使命而奋斗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上升为领导全国斗争的政党,成为代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党。为了更好地凝聚全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力量进行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建设,另一方面加强政权建设,同时调整国家建设的取向,把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解释为什么要这样修改时指出:“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十大政纲,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③ 这个变化为此后建立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基础。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91页。

② 参见陈荣华、何友良:《中央苏区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8页。

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这其中,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系统地阐述了在中国建设新国家的构想:“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在这个新国家建设中,毛泽东确定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建设框架,并对每一个领域的建设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取向。其中就新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毛泽东给出了明确的规定:“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所应该建立和决不可不建立的内部政治关系,这就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①这个建国方向一直指导着中国共产党此后的国家建设实践,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这个建国方向上确立起来的,并得到有效发展。1949年的《共同纲领》、1954年颁布的《宪法》和1982年颁布的《宪法》,都坚持在这个方向上规范国家制度,促进国家建设。

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全面掌握国家政权,并开始进行现代化建设,存在于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权建设与武装斗争相统一的建国实践框架,逐渐被政权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相统一的建国实践框架所取代。但是由于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判断失误,加上没有很好地解决现代化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所以新的建国实践框架对过去的实践框架的取代并不彻底,导致的结果是:国家建设的努力既不能完全摆脱“阶级斗争为纲”的困扰,也不能从不成功的现代化实践中获得有效支撑。“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革命后的国家建设陷入困境。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开始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中国发展的规律来全面把握中国的国家建设,使国家建设与人类文明发展相呼应,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相贴近,与国家的现代化目标相衔接,从而为新时期的国家建设提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确立,伴随着现代经济生活和经济制度的成长,以个体自主独立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开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677页。

始出现,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不仅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于是中国共产党在2005年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总体布局,从“三位一体”的结构发展为“四位一体”的结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①

改革开放所创造的中国现代化发展,为“四位一体”的国家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制度条件和发展动力。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目标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实现现代化,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巩固和发展。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上,随着国家建设框架的充实和明朗,中国共产党围绕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一次清晰地描述了中国未来的国家景象:“到二〇二〇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②

今天,中国共产党能够这样清晰地描述中国未来国家的景象,是与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的探索和实践分不开的,其背后凝聚了全体中华儿女的希望与期待、奋斗与心血,同时也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与追求。党领导人民进行国家建设,是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政治保障和基本动力。这是中国国家建设的基本形态,它依然决定着中国国家建设的未来。

三

这样的国家建设形态,显然不是人为预设的,而是由中国国家建设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过程所决定的。这种形态决定了中国的国家建设与其他社会的国家建设不尽相同:它有自身的特点和逻辑,也有自身的路径与进程。人类社会步入现代化之后,任何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社会,都必然要把完成现代国家建设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基本使命。由于各自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条件的不同,不同社会完成这个使命的出发点、动力结构、进程逻辑以及发展速度自然不同,因而不存在不同国家建设形态之间的优劣问题,关键看其是否有效、是否能够保持国家建设的持续进行。到

^①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

^②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目前为止,中国国家建设的基本形态应该说是有效的形态。这个判断不仅来自中国国家建设所展现出来的成就,更为重要的是来自这个形态给中国国家建设提供的具有长远效应的动力资源。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资源不是所有国家建设都可能获得的。具体来说,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一条比较成熟的发展道路。尽管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显示了“后者未来的景象”,^①但对于后者来说,迈向未来景象的路却必须自己寻找。许多时候,后者往往循着前者所展现的“未来的景象”而直接将前者所走的路作为自己迈向未来之路,于是把现代化简单等同于西方化。实践证明,这样的路是曲折的,甚至是走不通的。因而寻找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考验着所有后发的现代化发展国家,中国也不例外。近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不仅明确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且明确了中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在近三十年的探索 and 实践中,这条道路创造了中国发展的奇迹,被证明是适合中国社会的,是一套有效的发展道路。党的十七大明确了中国建设将长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道路的正确,必然创造持续的发展;持续的发展,必然创造有效的国家建设。

第二,一个有领导力的强大政党。现代国家的成长必须基于现代化发展的有力推动,而在现代国家体系尚未成熟的条件下,现代化发展必须有强大的领导力量来支撑和领导。发达国家是这样走过来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是赶超性的跨越式发展,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强大的领导力量,不但不可能统一、稳定地发展,甚至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转型都有困难。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成长,为中国全面开启现代化,进行现代国家建设的努力提供了中心支柱和领导核心。在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壮大的同时,也不断走向成熟,不仅具备了领导和整合社会的组织体系、领导体系和工作体系,而且具备了相当成熟的立国、治国、兴国、强国的理论、原则、方略、规划和目标。这样一个成熟有力的政党,无疑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其对社会的整合、对方向的把握、对路径的规划以及对进程的领导,都将对国家建设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

第三,一个规划长远的总体布局。国家建设的最终目标就是全面建成现代国家体系。如果把现代国家体系看作一座国家大厦,那么这座大厦的建设,就必须有总体的布局。这个布局要回答:建设什么、怎么建、如何展开、如何最终建成并使其长期巩固。所以是否有布局,关系长远发展;而布局是否科学全面,关系建设本身的质量。中国共产党在尚未全面取得政权的时候,就开始布局未来的国家建设,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06页。

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发展的第一个总体布局。基于这个总体布局,中国确立起了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制度体系。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从封闭建设国家走向开放建设国家。伴随着这样的重大变化,尤其是伴随着现代经济与现代社会的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发展了当年所形成的国家建设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布局结构,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四位一体”的布局结构,并且以经济建设为逻辑起点,有步骤地展开四大建设,力图依次完成四大建设,从而最终建成一个完整的现代国家体系。从紧随经济建设而开始的社会建设的发展趋势,以及正在努力掀起的文化建设新高潮来看,这个国家建设的总体布局,规划长远、路径正确、进程得当,具有相当的可行性,因而是值得期待的总体布局。

第四,一个合乎科学的行动逻辑。国家建设是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有效实践中展开的。在这种实践中,领导力量对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科学把握往往决定着实践的效益与进程。这种科学把握,一方面来自道路的选择、总体的规划,另一方面则来自行动逻辑的理性程度与科学水平。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独特的但又合乎科学的推进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而推动国家建设的行动逻辑,具体由三个层面构成。

第一层面,在追问根本中把握根本。领导的关键在于把握根本,并以此来主导全局。把握根本的关键在于提出根本问题,并在自我追问中,回答根本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探索和实践就是在这种以追问根本来把握根本的行动逻辑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至今为止,先后提出了这样三个重大的根本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显然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和把握,都对国家的健康成长有根本性的价值和意义。

第二层面,用解放思想和改革创新创造持续的、无限的发展。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创造奇迹的发展过程,其根本动力来自于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然而人的现实存在,是历史的存在、文化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以及制度的存在。这种存在状态决定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需要一个更大的自由空间引导和激化。为此,从改革开放第一天起,中国共产党就确定了以解放思想、不断创新为改革开放第一要义的行动逻辑。在这个逻辑下,国家的成长不仅拥有了持续不断的创造力,而且也拥有了及时、全面地吸纳人类最先进成就的思想基础与实践空间。强大的创造力和无限的吸纳力,必然快速催生国家的成长。

第三层面,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行动逻辑下,整合发展资源,协调发展问题,统筹发展进程,平衡发展格局。根据十七大报告的概括,中国共产党在这方

面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行动框架：“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①。

四

党的十七大对于中国国家建设和国家成长，列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时间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②从这个时间表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国家建设，中国共产党既有现实的目标，也有长远的规划。在这个时间表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国家建设的基本进程与步骤：首先解决发展问题，进而解决现代化全面达成问题，最后使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整个制度的获得持久的巩固、安宁、生机与繁荣。基于中国目前发展的实际状况，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和经验来看，只要我们能够创造协调全面可持续的发展，那么这些目标的达成是完全可能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也是完全可能的。

要创造协调全面可持续的发展，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和力量，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政党的力量。政党要有效地推动国家建设，就必须具有不断地随经济与社会发展而发展自身的气魄与能力。政党领导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发展是实现国家持续成长的关键。正因为这样，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一再强调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和发展。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富有挑战性的使命和任务。面对这样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别无选择。

党的建设和发展不是一项孤立的行动。政党的使命与任务，要求党的建设必须与国家建设有机地统一起来，通过党建推动国家建设，同时通过国家建设提高党建水平。这就要求党的建设不能仅仅从自身的逻辑出发，相反必须从国家建设和成长的大趋势、大格局、大体系出发。只有这样，党建才能与国家建设有机互动，才

^{①②}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 年 10 月 25 日。